盧梭：自然、不平等與個人權利

苑舉正

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

jjyuann@mail.thu.edu.tw

盧梭(Jean-Jacques Rousseau, 1712-1778)是一位具有多重面貌的創作者。從他作品的多樣性中，可以發現他是一位音樂家、文學家、語言學家、憲法學家、政治哲學家、教育家、植物學家、甚至「冥想家」。雖然盧梭在他的作品中展現了這麼多樣的風貌，但讀者往往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，盧梭令人感受最深的地方，還不是他所論述的主題，而是他對於「人」的關懷。

「人」，開啟了所有盧梭論述的內容。對他而言，所有與人相關的事物，都與倫理道德相關，而因此都與政治相關。當盧梭論及人類命運、不平等起源、教育的方法、甚至戲劇、音樂、植物學時，這一切都是為了道德/政治。因此，雖然盧梭展現多重風貌，但它們都是為了人類道德與政治所提出來的觀點。從最能代表道德/政治的著作來檢視盧梭，就是能夠全面展現盧梭思想的關鍵。

盧梭的「兩篇論文」反映出這一事實。他論述人脫離自然狀態，並成為政治社會動物的過程。這個「過程」，不但呈現了當代社會的發展，也敘述了盧梭自己的故事。從 1750 年盧梭以〈論科學與藝術〉贏得第戎學院論文獎以來，到 1755 年，他出版〈論人類不平等起源與基礎〉，五年內，盧梭先以「批判社會」的方式，然後以「歷史溯源」的方式，對於人類自詡的文明成就，提出最深沈的否定。為求理解盧梭的政治關懷，我們將他在出版「兩篇論文」之前的生活中，提出幾段經歷作說明。

盧梭是出生於日內瓦的公民。出生不久即喪失母親的盧梭在父親艾薩克(Isaac Rousseau)的引導下，閱讀大量書籍。艾薩克對於盧梭教導一些極為崇高的政治理想，並經常以古羅馬共和來比喻他們的祖國，日內瓦共和國。後來，因為艾薩克與人發生爭執，必須逃離日內瓦。頓成孤兒的盧梭，被送往育幼院。兩年之後他回到日內瓦，先作書記學徒，次年，又作雕刻學徒。命運的坎坷，使得盧梭不但寄人籬下，還要面對各種嚴厲的要求。1728 年，盧梭散步回家，發現日內瓦城門已關，他索性離開他所熱戀的祖國，展開流浪的生涯。盧梭遇見一位負責新教徒青年改宗的華倫夫人(Madame de Warens)，將盧梭安排至位於杜函(Turin)的教會收容所，進行改宗的準備與儀式。達收容所九天後，盧梭同意改信奉天主教，兩日後受洗，還獲得二十法郎的「改宗金」。盧梭坦承，在改宗的過程裡，他並沒有意願。但是，因為許多現實的因素，以及生活中的困頓，迫使他放棄自由意志，也放棄他祖國。然而，物質上的缺乏，不但沒有讓盧梭為貧窮感到難過，反而為追逐金錢的人感到悲哀。終其一生，盧梭均譴責金錢的虛假價值，因為它代表慾望的展現。真正的價值在於人本身，人所作所為，人意念的純粹性，人的道德、德行。盧梭在

此即表明他一貫對於人類自然本性的期待，不認為惡行全然來自於人本身，而來自被壞制度所治理的人。因此，若求人類德行之改善，必須從政治制度著手。盧梭在 1743-1744 年，擔任法國駐威尼斯共和國大使，蒙泰巨(M. de Montaigne)秘書的一段經歷，為他日後寫作有關政治方面的論述，奠下實際的經驗基礎。

1742 年，盧梭經過杜潘夫人(Mme Dupin)社交圈間接關係的介紹，得以出任蒙泰巨大使在威尼斯的助理。1743 年上任之後，盧梭馬上展現出他作為一位大使秘書的天才。他的能幹，突顯出大使的無能，但是他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，使得能幹的一方，受到攻擊、屈辱與不幸，而無能卻居上位者，永遠保持傲慢、殘忍與易怒。對於盧梭而言，這就是社會秩序的不平等，於其中，盧梭覺得無論用什麼方法他都不會得到正義。

盧梭的體認，展現在他對於社會德行敗壞的認定。無怪乎，當他看到「第一篇論文」題目時（「科學與藝術的重建，是否有助於道德習性的淨化？」），他自稱有了「天啟」的感覺。從此四、五年時間，他文思泉湧，著作「兩篇論文」，先是批判社會，然後是分析社會敗壞的原因。

盧梭承認，雖然〈論科學與藝術〉得到第戎學院的論文獎，但這是一篇「熱情之作」，缺乏邏輯與秩序。盧梭在論文一開始就遍舉歷史例證，說明知識成長導致道德敗壞。他舉出五個因為文明發達而道德敗壞的帝國（埃及、希臘、羅馬、君士坦丁以及中國），並將它們對比於五個尚未啟蒙但具有德性的民族（波斯人、斯基泰人(les Scythes)、日耳曼人、羅馬共和時期以及瑞士人）。盧梭在此建立一個「歷史規則」（文明越發達，道德越敗壞）的企圖很明顯。他在強調德行，否定科學的同時，讓人聯想存在於西方傳統中有關基督教德行（例如安貧信神）與異教文明（例如希臘科學）之間融合的問題。雖然在〈論科學與藝術〉中，盧梭並沒有清楚地說出這個關連性，但他卻巧妙地將西方傳統中有關德行與科學之間的辯論，帶回十八世紀的法國。

盧梭企圖論述為什麼，科學與藝術的發展必然導致道德習性的敗壞。對於這個問題，盧梭並沒有明確地說明，究竟是原初善良人的本質中及已經包含「注定墮落」的因素呢？還是科學與藝術的發展，污染了人的心靈？我們可以說，在著作〈論科學與藝術〉時，盧梭尚未發展出完整的體系，但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的方向已經大致確立。盧梭論及政治問題，都是從天真善良的原始人開始，分析他們德行沈淪的過程，結果是社會制度的出現。對盧梭而言，社會代表一種負面的價值因為許多原先不存在的慾望，都是有了社會這個組織之後，才發展起來的。這些慾望也會因為每一個人天生才能或後天機緣，分別有不等的滿足情形，而社會就是為了維持這些不平等而存在的。「不平等」的問題，漸漸在盧梭心目中浮現，成為政治社會發展問題之核心。

不知是巧合，還是有心的安排，1753 年「第戎學院」又舉辦徵文比賽，題目：「人類的不平等起源為何，它是自然法所授權的嗎？」。早就準備寫一篇有關這個題目文章的盧梭，在《懺悔錄》中回憶：「這個偉大的題目震驚了我，第戎學院怎麼敢提出這樣的題目。」為了撰寫這篇論文，盧梭在「聖日耳曼森林」（la forêt de

Saint-Germain)中待了一週，找尋「原初社會」的自然印象。

為什麼一定要回到自然呢？因為盧梭認為，富人與窮人之間的不平等顯現出人性中的「惡」，並具體地展現在社會制度中。但是，現代社會的「惡」，來自何處呢？盧梭認為，「惡」來自被壞制度所治理的人(l'homme mal gouverné)。那麼，什麼時候開始，無辜的人(l'homme innocent)變成被壞制度所治理的人呢？盧梭應用「假設推理的方法」(la Méthod hypothético-déductive)，以現存的事實當成結果，透過假設與推理，回溯原先人類最原初的狀態。在重建人類的過去的同時，盧梭卻強調，這是「假設的」，並非「歷史事實的」。對盧梭而言，懂得用文字語言作記載的人，已經是脫離自然狀態的人。用隱喻的話來說，歷史就是建立在壓制自然的「善」之上。可是，人因自然而獲得的「善」，一直存在於我們的內心之中，不在歷史的演變之下消弭。這是一場「自然的善」與「歷史的惡」之間的對立。「惡」的歷史不斷地在拒絕、覆蓋、甚至穿越「善」，但卻不能改變與摧毀「善」。這是為什麼，盧梭認為歷史真相的探討，將無助於理解人類不平等的起源，而應當回歸到最原初的自然狀態。盧梭坦承，這是一個實用的考量，因為「自然狀態」「已經不存在，也可能不存在，或許根本就不曾存在過」，但是「為求獲得能夠針對現狀作判斷的概念，它是必要的。」然而，盧梭又說：「所有探討社會基礎的哲學家，都能感受到回溯至自然狀態的必要性，但他們之中，沒有任何人能夠真正回到這個狀態。」盧梭指的，是霍布斯(T. Hobbes)，這位論自然狀態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。

霍布斯認為，自然狀態中的人，「沒有任何善，因為自然只有惡。」盧梭認為，霍布斯的錯誤，在於他一方面宣稱描述自然人，卻在實際上，描述那已經啟蒙的道德人。自然人根本就不知道「道德」為何。自然人因為無知，「所以不知道如何運用理性」，但因為同樣的理由，「所以也不知道如何濫用它的能力。」我們可以說，「自然人不壞的原因，正是因為它不知道什麼是好。」盧梭認為，在理性發展前，情感中包含兩項自然天性，「自保」(l'amour de soi)與「憐憫」(pitié)；它們使得自然狀態維持在一個相對均衡與穩定的狀態之中。為求「自保」，自然人必須以力相爭維持生存的條件，但他的需求也僅限於最低階層，容易滿足。因此，雖然自然人並不高雅，但也不會有真正的衝突。加上，所有人天生即具備的憐憫心，使得人不會因為見到別人痛苦而感到快樂。這也使得處於弱勢的人，不用擔心強者的無情攻擊因此，活在這個「前政治狀態」中的自然人，是好的，因為他們是「自足的」。它們是「自足的」，因為他們自己與外在環境維持了一個均衡，使得人與人之間，享受了自由與平等。他們是自由的，因為他們在物質的、心理的以及人際的需求上，都能夠獨立地被滿足。他們是平等的，因為他們自然的不平等，不具有任何道德的意義。這是一個無知於自己好壞的人所組成的狀態，於其中，沒有人的內心與外表是分離的；如果他粗暴，那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叫精緻，如果他誠實，那是因為他不知道什麼叫欺騙。

人的天性中，包含一種「求好」(perfectibilité)的特性，會使人在自然環境中，追求比較好的生活空間。若是自然環境維持滿足「自保」條件時，自然人不會主動「求好」。但是，當自然環境改變了，當人口增加了，物質缺乏了，氣候改變了的時

候，人會求好，以圖「自保」。這代表「自足」條件的破壞，也因而會出現依賴、分工、比較、獎懲的情況。結果是，原先人與人之間那種不具有價值意義的「不平等」，現在開始展現它們在競爭環境下的優勢。那些比較強壯、比較聰明、比較敏捷、比較美麗、比較大膽的人，就會注意到他們的才能，並會想盡辦法，讓這些長處能夠在競爭的環境中，發揮最大的價值。原先那種不具道德意義的不平等，變成有社會價值的不平等。人的行為與內心也不再合而為一；行動的目的，是為了受別人的肯定與讚揚。

人墮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無須多久，這種不平等的現象不但發生在財富與權力上，也發生在心智與外表上。總之，只要是能夠贏眾人注目的品質與才能，都是大家趨之若鶩的對象。追求社會價值，成為所有人努力的方向。至於個人本身真正擁有什麼，則變成完全不重要的東西。「真實與表面變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，從這個差別中，出現虛假的排場、騙人的詭計和所有成列的惡行。」慢慢地，心智與生理上的不平等，逐漸轉換成為富人與窮人之間的不平等，然後是主人與奴僕之間的不平等，最後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不平等。人與人之間發生無止境的爭端。結果就是無止境的戰爭與謀殺。「甫誕生的社會，成了最恐怖的戰爭狀態。」

當富人發現，持續的戰爭，不但花費所有累積的財富，也讓自己處在永遠的不安之中。為數眾多的窮人雖然更慘，但卻處處與富人拼命，終也非長久之計。盧梭說：「迫於必要性，富人最後想到人類心靈中最具心思的計畫。」這就是一種契約關係。這個契約「依照聰明的法律治理我們，保護與捍衛這個組織中的每一位成員，趕走共同的敵人，並將我們大家維持在一個永久的約定關係之中。」在這個約定關係中，傻呼呼的窮人還以為終於受到公平的待遇了。殊不知，法治社會的起源，永不回頭地破壞了自然自由，卻將財產的不平等固定成為法律。現在，為了少數人的野心，將多數人置於工作、奴役與悲慘的境地之中，原先非常精緻的掠奪變成無可挽回的「權利」。這不是「自然權利」而是「公民權利」；它存在於「公民社會」中，不但用來約制「公民個人」，其實也還隱而不彰地合法化那原來因霸佔而出現的不平等。

「兩篇論文」不但建構了盧梭政治思想的前期觀點，也展示盧梭觀點的兩項概念。第一、是「自然完美論」。盧梭明確地想要在讀者心目中留下如下印象：「自足」原始人的習性，是人性的典範。人類的歷史，就是一部「破壞自足的歷史」，充斥著人與人之間的交相爭利，直到不平等的結果，在公民社會中被制度化，成為受法律保障的「公民權利」。第二、是「歷史悲觀論」。所有盧梭作的，只是表達他對過去的懷念，但他也非常清楚，原始人的純真，永遠不會再回來了。他不諱言，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，感到無限的失望，但是這個墮落的歷程已經發生了。或許我們只能以〈創世紀〉中，人失去伊甸園的描述來比喻盧梭作品中，他對於人失去自然善良所抱持的遺憾。